在他们看来，不遏制中国是不行的，北京不愿成为“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秩序中……西方化和负责任的参与者”。

旅法20年的著名时评专家郑若麟多次撰文指出，当今世界正分化成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阵营，所以中下层的极左翼和极右翼民众都在“反对全球化”的旗号下联手站在了一起，而他们的背后还有一部分传统高层右翼的产业资本力量。而中间派和传统左、右翼的大部分，因为支持全球化，也站到了一起……西方政治阵营正在发生大分裂、大分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日益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分歧，贫富差距日益严重。在英国，全球精英阶层作为科技革命及经济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坚定地反对脱欧，但在大城市边缘、主流媒体之外，被发展所遗忘的草根百姓却通过脱欧公投发出了被埋没的声音。

而在美国，主张顺应全球化、赞同文化多元主义的阶级因为特朗普的当选而失去了最高权力，以媒体为渠道激烈地宣泄着不满，特朗普被主流媒体“标志化”“妖魔化”的趋势日益增强，也在一定意义上暴露、加剧着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眼下，英美遵守的共同价值——资本主义市场自由及其所导致的世界精英与社会分裂正在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性、结构性的矛盾而走向政治衰朽。

沈逸尖锐地指出，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无法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新背景下，继续实施有效的治理。这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衰朽，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矫正，则整个世界将加速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种矛盾的根源，深埋在更加深刻的经济基础之中。2016年，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的首席操盘手斯蒂夫·班农曾经有过一个经典描述：中国出口过剩，导致英国和美国的产业工人被掏空。班农说对了部分的事实，这一轮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及暴力运动的兴起，关键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由产业工人构成的阶层塌陷了。但是，班农也应该非常清楚，真正需要为此负责的，不是中国，而是华尔街的金融肥猫们，他们对利润的贪婪，超过了对上帝的敬畏，更不要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热爱。

郑若麟更是以自身的经历见证了这种塌陷。郑若麟告诉《新民周刊》，目前，法国人的失业率已经高达8%—9%，一半以上的人拿的都是最低工资，大约1600多欧元，扣完税以后拿到手也就是1100多欧元，相当于人民币大概8000到9000元人民币，问题是法国的物价比中国国内贵得多得多，房价在巴黎也高得惊人。租一个20平方米的小房间，房租可能就要七八百，甚至于近千欧元。“今天50%拿着最低工资的法国人，跟中国北上广深等一些大城市的居民相比，他们的收入从绝对数到相对购买力，都已经落后于中国”。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民主体制下的一些国家开始实行福利政策的时候，贫富差距一度有所缩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入最高的人群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在西欧和美国这一占据总财富的比例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10%的高收入人群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

现在法国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急剧萎缩，大多数都掉进了穷人的阶层，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上升到富裕阶层，而且富裕阶层的财富还越来越集中。这一惊人的现象证明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其实质就是金融资本对实业资本的全面胜利。

逃不掉的宿命

郑若麟指出，因为中国向中高端生产链的进发，损害了西方产业资本的利益，尤其是损害了西方产业资本所雇佣的中下层劳动力的利益。所以当产业资本开始以极右翼的政治色彩，开始反移民，反对企业外移，反对金融资本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中下层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左翼民众的强烈支持，这个时候百年未遇的一个新现象出现——那就是西方的统治阶级，西方的财团出现分裂，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益分道扬镳的现象。而这两大利益之间的冲突，可能正在成为今后影响整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冲突。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支持全球化的欧洲、中国等国家，与反对全球化的特朗普的美国等国家正在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个对立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对立。它可能超过了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因为第一霸主国家和挑战者之间的不同而带来的冲突。